武威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

1991 年 4 月，应武威专署之邀，滞武威四整天，承专署、市和博物馆诸同志的引导，重点了解了自汉唐以降的重要文物。现结合部分文献将武威市郊蒙元时期与藏传佛教有关的遗迹整理如下。

1227 年西夏亡，其前一年西凉（凉州）即为成吉思汗所陷。1235 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故地。1243 年，阔端承制得专封拜开府西凉，此西凉城即仍夏时之旧。现存凉州一带的蒙元遗迹，即以与阔端一系和与之关系密切的藏传佛教萨迦派上层人物有关者最为重要。

凉州著名的四座藏传佛教寺院：白塔寺（武威城东南 20 公里）、海藏寺（城西北 5 公里）、金塔寺（城西南 15 公里）、善应寺（城西 10 公里莲花山）相传皆为萨迦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以下简称萨班）所建①。后两处闻已荒废，此次走访者仅为前两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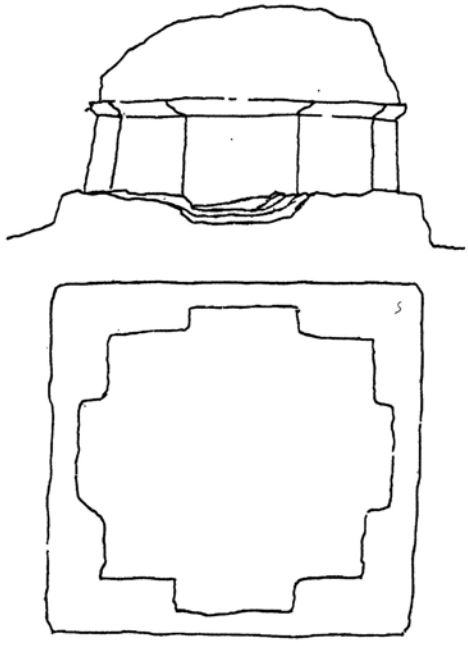


图 12—1 白塔寺残存大塔立面与平面速写

白塔寺原为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其范围据云：东西二里半，南北一里半，原有围墙，有若城垣。《乾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条记此寺名百塔寺，云以“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该寺近年屡遭拆毁，现仅残存大塔自覆钵以下部分，大塔相传即萨班塔，最下建方形基座，其上为十字折角塔座，塔座宽约 8 米。塔座之上为覆钵。自基座至覆钵残高约 5 米余（图 12—1）。全部皆夯筑，但基座、塔座都残存砌砖痕迹，知塔毁之前外表包饰青砖。覆钵内曾出有大量模制小陶塔，又出明宣德五年（1430

年）《重修凉州白塔志》、宣德六年（1431年）《建塔记》两小碑，承市博物馆孙寿龄馆长之介，得睹两碑拓本。宣德五年碑正面镌汉文十四行，录文如下：

“重修凉州白塔志」凉州为河西之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白塔，不知」起于何代，原其本乃前元也烬火端王重修，请致」帝师撒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燹，颓毁殆尽，瓦砾」仅存。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琐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朝，赐寺名曰庄严。宣德五年六月，塔先成，所费甚重，」肃王殿下捐泥黄金，特命琐南监参等缮写《大般若经》一部，凡一十」四函，计三百卷，不月而成，施赀无量，仍造小塔十万，实于大塔」之心。及」钦镇甘肃太监王安、平羌将军都督刘广、都指挥吴升及诸檀善等」由是书此志于塔中，俾后之君子知其所自，千百载后同善之」士幸勿毁之，必与存之，共布福惠，岂不美乎。谨志。」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六月吉日。」”

所记也烬火端王，即阔端；撒失加班支答即萨迦班智达。碑阴横镌藏文二十五行。此碑圆首，据拓本测通高50厘米，宽29厘米。宣德六年碑正面碑首镌篆书“建塔记”三字，碑面镌汉文十二行：

“清信奉」佛」肃府内臣黄潮宗法名福聚，感戴四恩覆荫」三宝维持，无由答报，谨发诚心，喜舍赀财，于凉州重兴」白塔寺，内命工起建」菩提宝塔一座，所集福利专为祝延」圣寿」肃王千秋，更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祚绵长，边疆宁谧，军民乐业，」四恩普报，三有均资，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六月初吉日立石」肃府内臣黄潮宗」化主妙善通慧国师伊尔吉锁南监参。」”

碑首镌梵文三，碑阴面镌汉文四行：

“献陵尊阳生刘硕书丹」古杭儒士沈福镌字」石工贺进」泥水匠作头李常」”

此碑扁圆首，据拓本测通高42.8厘米，宽26厘米。

大塔东侧耕田中树有清康熙壬戌（二十一年·1682年）《重修白塔碑记》一通，碑额篆书《重修塔院碑记》。因时间仓促，仅录得碑记前半所述建塔始末、尸骨灵异及最末所记撰人与年月：

“重修白塔碑记」昔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而震旦国□□□□□六座，甘州之万寿塔与凉之姑洗塔居其二焉。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缮译」番经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於」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后六载即涅槃，沐浴焚化，空中见祥云五色霞光万道，于口上坎骨显出」西天引字，即唵字也。于顶骨显出文殊」菩萨、喜金刚佛二尊。于囟门骨显出典勺佛。于后脑骨显出释迦佛像。于两耳上显出尊圣塔二座。於两膝盖显出观音菩萨、救度佛母二尊。于

手指上显出弥勒佛、不动怒佛。于胸前显出金刚杵。于中间显出西天　字，即吽字也，兼舍利无数，光彩照耀，王与众」等靡不踊跃赞叹，合掌恭敬，缘建白塔，将」板只达金身灵骨装入在大塔内，其余众塔俱有舍利。缘板只达原系金刚上师化现流传，经二十五转身，故显化灵异一至于此。予于康熙十一年间延请净宁寺法台魏舍喇轮真同弘济寺罗汉僧罗旦净从番经译出，而始知白塔之源流也。元此塔摄受」极大，据经典云：若有人观想，或手摸眼观并绕道一转，添泥一把，培土一块，赞谈经咒真言，功德无量，永不堕三途之苦。□塔土或落在飞禽走兽身上，亦得解脱。在我中土众生或未深知，若西番之喇嘛高僧来绕塔者络绎弗绝，诚知此塔功德实与阿育王」所造之姑洗、万寿两塔等，而我中国之人特未知耳……」”

“靖逆侯靖逆将军标下随征同知古勾章颜翼超薰沐撰」时」龙集康熙壬戌年菊月□□吉旦立」”

所记果诞王即阔端，板只达即班智达。番经云云应是藏文记录。此类藏文记录或可于西藏萨迦寺求得之②。宣德九年（1434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撰《汉藏史集》，其下篇《具吉祥萨迦世系简述》据萨迦历代祖师传，记萨班塔建于凉州幻化寺：“萨迦班智达护持法座三十五年，于七十岁的阴铁猪年（辛亥·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诸种神异兆伴随下，在凉州幻化寺③去世。在该地建有纪念他的佛塔，并经常祭祀”④。因疑此白塔寺或即藏文文献中之幻化寺。又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昆氏家族之世系》记该塔建成后，由“上师八思巴前去凉州，为法王（萨班）之灵塔开光”⑤。

海藏寺位武威旧城西北郊，相传萨班曾驻锡此寺，但该寺现已无确切的蒙元遗物。寺内最早的建筑是最后的大殿——无量殿。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周绕副阶，外观歇山重檐，斗拱疏朗，五铺作出双假昂，殿身无内柱，用四椽栿，脊槫下有康熙三十年（1691年）重修梁记。副阶前廊左侧立《海藏寺藏经阁碑》记：“明成化间（1465～1487年），太监张睿因其旧而庀材鸠工……康熙三十六年（1677年），少保孙公来莅五凉，悲庙貌之凌夷，捐赀而葺之”，碑阴镌雍正三年（1725年）钦命执照。右侧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邑人孙倓撰修葺碑记。因知此殿原为藏经阁，创建于成化，入清屡经修葺，故结构虽多明制，而细部已杂清式（图12—2）。无量殿前为天王殿，殿基原为一高台，殿门上悬“灵均古台”匾，传说此高台筑于前凉张茂⑥，验台版筑夯层薄厚不匀，薄者8厘米，厚有超过13厘米者，因疑其夯筑时间似不在西夏之前，而与萨班时代接近。

又近年迁建于大云寺后的原火神庙大殿内，陈列铜头铁身藏僧坐像一尊，等身大小，面部表情严肃，原供奉于城东南15公里大河驿之铜佛寺。据传过此之西藏喇嘛多认定即萨迦坐像（图12—3）。果是，此像应是萨班逝世后不久所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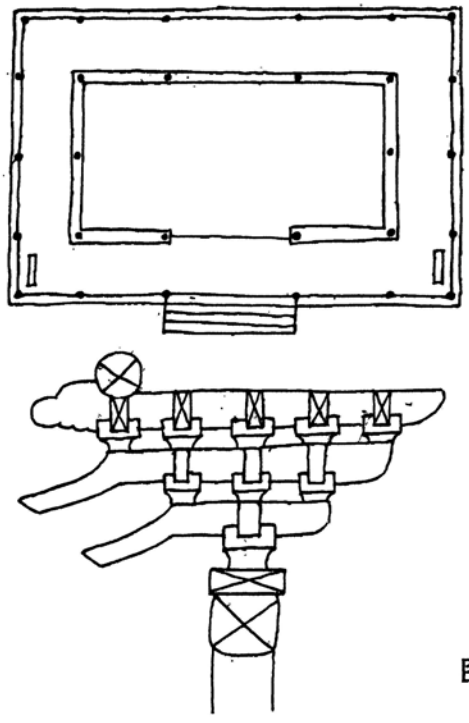


图 12—2　海藏寺藏经阁平面及现存斗拱速写



图 12—3　原火神庙大殿内的铁身铜头藏僧造像

按萨班事迹主要著录于藏文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森先生曾辑录整理，所撰《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五篇《萨迦派》中，有对萨班较全面的评述，现摘其有关部分：

“1240 年，阔端派他的将官达尔汗台吉多达率军进藏，发现藏地由各个地方势力割据，不相统属，难于单靠武力进行控制。多达建议阔端选用当地领袖，协助蒙古人进行统治。在当时的（西藏）各教派中，他见到噶丹派寺庙最多，分布最广；达垄塘巴戒律清整，最有德行；萨迦派的班智达学富五明，声誉最隆。他建议阔端召见萨班。萨班在 1244 年受阔端召，他就在当年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以及随从人等从萨迦动身。到拉萨以后，他让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恰那和一部分随从先去西凉，他个人沿途逗留。看起来，这可能是他和卫藏各个地方势力对于归顺蒙古进行磋商。1246 年，萨班才到达凉州，当时阔端为推选可汗不在凉州。1247 年，阔端回凉州后，才和萨班见了面。阔端和萨班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后，由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卫藏地区从此

归蒙古统治，实际也从此时加入祖国版图，同时萨班也为萨迦派取得了它在卫藏地区的政治、宗教领袖地位。”

“萨班个人此后就一直住在西凉……萨班在西凉曾经为阔端治愈过一次比较严重的病，因此，更得到了阔端对他的信任。相传他在西凉也讲授过佛法，在讲经时有四个人为他做翻译，分别把他的话译为蒙古语、畏兀儿语、汉语和当地的藏语。萨班又曾为蒙古语采用古畏兀儿文的字母的字形，创制过一套蒙文字母。他的两个侄子，遵从阔端的命令，八思巴仍继续学习佛法，恰那则改着蒙族服装，学习蒙语。1251年，萨班死于西凉……1251年，阔端、萨班相继逝世。同年，蒙哥即位于库腾敖拉，将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划为其弟忽必烈的分地。藏族地区原为阔端领地至是易主。”

萨班来凉，促成了蒙藏、藏汉民族间的团结，维护了祖国的一统。其后驻锡凉州，卒后又即西凉建塔，盖其时藏族地区隶属阔端，萨班居凉正是不断加强与内地联系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白塔寺和萨班墓塔于以后年代仍在发挥维系民族团结的作用⑦。因此，萨班的功绩值得永久纪念，其寺、塔应酌予修复；前述萨班造像亦当做为重要历史人物形象予以保护，不应仅视为艺术品陈列而已。

阔端一系的遗迹在凉州境内有墓地、斡耳朵城址和永昌路城址。阔端墓地见录于《乾隆甘肃通志》卷二五凉州府陵墓条：“永昌王阔端墓，在永昌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斡耳朵城，其西又有妃墓。”斡耳朵城见同上书卷二三凉州府古迹条：“永昌县斡耳朵古城，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地名广（黄）城儿。有永昌王避暑宫，遗址尚存。”阔端墓地情况不详。位于黄城儿（现写作皇城）的斡耳朵古城，甘肃文物研究所戴春阳同志曾往调查，云确有遗迹可辨。永昌路城见《大明一统志》卷三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甘州左卫古迹条：“永昌城，在凉州卫城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治此。”该城之建，《元史·世祖纪》四云至元九年（1272年）阔端子“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寻改府为路，至元十年（1273年）七月“省西凉府入永昌路”。《元史·地理志》三又记：“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永昌路城明清置永昌堡，现名永昌镇。镇内王宫遗址近代犹存⑧。元城遗迹，据市博物馆胡宗秘馆长谈：夯筑城垣尚完好，方形，每面约长0.5公里。城南2公里石碑沟，有火州畏兀儿（高昌回鹘）君臣墓葬，墓冢已不显露，但遗有丰碑多座，现存原地的有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⑨，有名的至顺三年（1332年）《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现仅存下段，1933年移陈武威民众教育馆，即今市博物馆⑩。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乾隆武威县志·文艺志》碑记条曾录全文⑪，该碑详记火州畏吾儿王室入属蒙元后，因海都、都哇东侵逐次移居永昌⑫和与蒙元皇室世为婚姻事：

“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日，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儿补花，自其先举

全国以归我太祖皇帝……至帖睦儿补花佐朕理天下，为丞相，为御史大夫……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伐石树碑而命国史著文而刻焉……太祖皇帝龙兴于朔漠，当是时，巴而术阿而的斤亦都护在位，知天命之有归，举国入朝，上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诸第五……次子玉古伦赤的斤嗣为亦都护……薨。弟乌木剌的斤嗣为亦都护……薨。至元三年（1266年），世祖皇帝用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十二年（1275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围火州……其后入朝，上嘉其功，锡以重赏，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儿，定宗皇帝之女……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子纽林的斤方幼，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仇。上壮其志，锡金币钜万，妻以公主曰不鲁罕，太宗皇帝之孙女也。主薨，又尚其妹八卜义公主，遂留永昌焉……（武宗皇帝时）嗣为亦都护……仁宗皇帝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八卜义公主薨，尚公主曰兀剌真，阿难答安西王之女也。领兵火州，复立畏吾而城池。延祐五年（131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长曰帖睦儿补花，次曰篾吉，皆八卜义公主出也。次曰太平奴，兀剌真公主出也。帖睦儿补花大德中（1297～1307年）尚公主曰朵儿只思蛮，阔端太子孙女也。至大中（1308～1311年），从父入觐，备宿卫……出为巩昌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奔父丧于永昌……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天历元年（1328年）十月，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让其弟篾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篾吉尚公主曰班进，阔端太子孙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补颜忽礼……”⑬

所记贴睦儿补花、篾吉所尚公主皆阔端孙女，即诸王只必贴木儿或其兄弟行之女。出嫁纽林的斤的两公主皆太宗孙，疑即阔端女，故纽林的斤以“北方军”势盛，“遂留永昌”，后“丧于永昌”，并“葬永昌”。永昌者，其岳家欤？阔端父子以婚姻维系邻近的地方权势，亦施之于其南邻藏族地区。1244年，阔端召萨班，同年萨班的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即抵西凉，此后，恰那长期住在凉州，《汉藏史集·具吉祥萨迦世系简述》记恰那事迹云：

“上师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生于其父（桑察·索南坚赞）五十六年的阴土猪年（己亥·1239年）。他六岁时，作为法主萨迦班智达的随从前往凉州……他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那里学习了灌顶和许多经咒。汗王阔端让他穿蒙古服装，并把公主墨卡顿嫁给他。他朝见薛禅皇帝后，薛禅皇帝封他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并为他设置左右衙署，委派他治理整个吐蕃地区。在整个吐蕃和萨迦派中，他是最早得到王的封号和职位的人。”⑭

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昆氏家族之世系》记恰那后期事迹云：

“恰那多吉在凉州等地住了十八年，二十五岁时返回萨迦大寺。此后三年中，他

努力修行，引领众生成熟解脱。二十九岁时即阴火兔年（丁卯·1267年）七月一日于廓如书楼示寂。”⑮

《汉藏史集·具吉祥萨迦世系简述》又记恰那子达玛巴拉合吉塔在凉五年：

“恰那多吉（后来）娶了夏鲁万户家的女儿玛久坎卓本为妻，她于恰那多吉去世后六个月的阴土龙年（戊辰·1268年）正月生下达尼钦波达玛巴拉合吉塔。由八思巴护持此遗腹子……达玛巴拉十四岁时到了朝廷，他虽然只受了沙弥戒，但继承了上师八思巴的法座……后来，达玛巴拉娶了诸王启必帖木儿的公主丹贝为妻，住了五年，受命返回吐蕃，到了朵甘思。”⑯

启必帖木儿即只必帖木儿。达玛巴拉滞凉时期约在至元晚期。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成书的蔡巴·贡噶多吉《红史》的《萨迦派世系简述》中，还记录了达玛巴拉的堂弟、八思巴异母弟达尼钦波桑波贝之子索南桑布年轻时也曾居凉：

“达尼钦波桑波贝……住在蛮子地方时，所生的儿子为索南桑布大师，年轻时在凉州被封为国公。格坚皇帝在位时还俗，娶公主门达干，被封为王，返回蕃地，在朵甘思去世。”⑰

达尼钦波桑波贝居蛮子地方的时期，是自至元十九年迄元贞元年（1282～1296年）⑱，依此推算索南桑布年轻时，约当成宗大德年间，其时诸王只必帖木儿尚健在⑲。由上可见阔端父子不仅结亲畏兀儿，亦联姻萨迦，且又肩负安抚、卫护两方之重任。在蒙元一代，特别是蒙元前期，阔端一系镇抚河西，在维系西部与西南诸族和安宁边境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关他们的遗迹、遗物，亦应进行系统的调查，予以重视。⑳

1994年5月，趁调查天梯山、金塔寺石窟之便，除再访武威白塔寺外，还参观了1987年发现的亥母洞（图12—4）。亥母洞位武威西南新华乡缠山村，系就崖体裂罅稍加修整者。洞前建小殿，小殿为近年所重修，据殿内右侧所立清雍正四年（1726年）亥母洞石碣，知此近年重修系袭用清初故址。据孙寿岭馆长介绍㉑：1989年清理小殿后部坍落之土石时，于殿后壁前发现早期木沿佛桌，桌上及附近尚存有西夏文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一经折式长卷，同出有西夏末期乾定申年（1224年）、酉年（1225年）、戌年（1226年）㉒文书。是此清初小殿又沿承更早的旧基。小殿后壁左侧即亥母洞开口处。洞窄长，内原建喇嘛塔四座，纵列成行，四塔皆圮残，自前第二塔刹柱上缠绕唐卡一帧，第三塔即示意图（图12—4）内之A塔，是四残塔中保存较好者。该塔相轮中部以上虽已坍失，但从残存部分如相轮粗壮、塔门形制以及覆钵上部垂饰之缨珞样式等，仍可大致推测其年代不晚于13～14世纪，盖与上述佛桌附近所存之西夏文佛经和乾定年文书为同时物。第四塔下部砌出复式十字折角形基座，此式基座亦为13至14世纪喇嘛塔中所习见。第三、四塔间，靠右壁地面凿出长方槽，内堆置模制小陶塔甚多，此即《元史·释老传》所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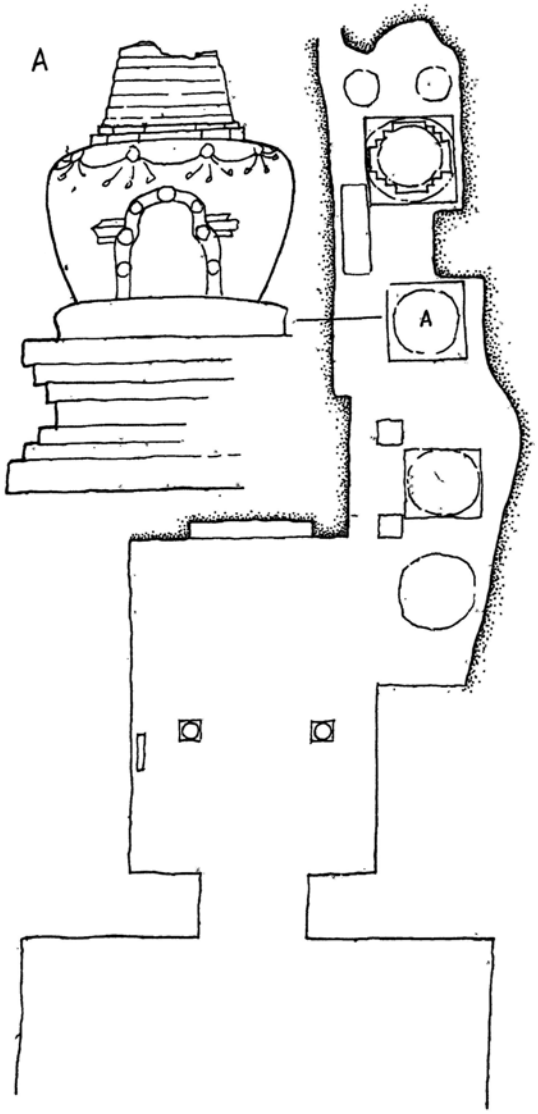


图 12—4 亥母洞平面和 A 塔(自前第三塔)速写

"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亥母洞后壁右侧有小洞，须匐伏而进，因深暗未入。亥母洞不见文献记录，但其名耆老相传，且有雍正碣可证㉓，当无讹误。按亥母系藏传佛教噶举派修密法之重要本尊㉔，藏文文献记自 12 世纪后半，西夏王室即与噶举关系密切㉕。西

夏亡后，忽必烈亦曾重视有德行、法力大的噶举高僧㉖。元至元九年（1272年），八思巴领总制院即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之后，噶举在甘青地区的传播并未停止㉗。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顺帝北奔后，明廷更有意扶植噶举㉘。因此，16世纪后半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之前，噶举寺院在甘青多有发展㉙，然则此武威亥母洞之经历绵远，实自有其悠久之历史背景也。

注　释

① 1994年承武威市博物馆赠康熙壬戌《重修白塔碑记》拓本一份，知此碑文后半有“凉州之西莲华寺与南之金塔寺，北之海藏寺，并东之白塔寺，俱系圣僧板只达所建，以镇凉州之四维，俾人民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之福……”之语，因疑上述武威耆旧之传言，或即渊源于此碑。

② 达钦阿美夏·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昆氏家族世系》记萨班火化后云：“（辛亥·1251年）阴历十一月十四黎明时分，曾出现各种宝幢、妙音、供赞和地震，法王萨班圆寂矣。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火葬遗体之青烟幻变为彩虹，众生听见各种妙音。法王（萨班）大部分遗骸变为无数的自现舍利和佛像。要赞颂法王萨班利众生之事迹，正如雅垅巴扎巴坚赞所云：顶之胜髻为喜金刚，美丽无垢之文殊身，额相似如总摄轮群，后颈部位藏薄伽梵，肩骨长有喀萨巴尼，脚掌乃属观世音，背脊有密宗四佛母，双膝下跪见救度母。右手指向那伽森林，弥勒法转之大手印，十幻化乃依止此身。梵天音是空性狮声，无生意赞刻有‘阿’字，二耳上有一尊胜塔，誓言金刚见名为‘吽’，纯洁思想生自成法身，亦有无数各种舍利”。似与此碑所记之灵异有关。《萨迦世系史》撰就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译文据陈庆英等译本，pp.97～98。

③ 《萨迦世系史》记此幻化寺云：“（阔端）请魔术师们在一前所未有的地方幻变一座奇有之寺庙，此后阔端对法王萨班说：你是被我召请来的一位贤者……现在幽静地方有一圆满寺庙，特赐与你，请前往……当到达此地时，法王一看即知悉此为幻变之寺庙，遂祓除许多怖畏守门之鬼魔，并把开光之花撒向其他尊者身上。据传当时未破除之幻术，现在还能看到，故称之为幻化寺”。陈庆英等译本，p.91。

④ 据陈庆英译本，p.202。

⑤ 据陈庆英译本，p.118。

⑥ 张茂建灵均台见《晋书·张轨传附子茂传》。谓灵均台在今武威城北，始于《大明一统志》。该书卷三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甘州左卫宫室条：“灵均台在凉州卫治北，晋明帝太宁初张茂主姑臧时所筑，遗址尚存。”

⑦ 萨班精通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当时即闻名于世。主要著作有《三律仪论》、《正理藏论》和《萨迦格言》。萨迦派失势后，盛名不衰，为噶举、格鲁等教派僧人所尊重。“文革”前，青藏僧人过凉多谒塔礼拜。

⑧ 《陇右金石录》卷二记武威关帝庙落成碑云：“按此碑……在武威永昌堡先师庙，题为大明崇祯

辛巳（十四年·1641年）三月庙宇落成虔赞碑有云：武威郡之北三十里有遗址曰永昌堡，乃元亦都护高昌王建都也。我太祖乘六御天，诞受万夏，内修关庙，年深颓坏，重为修葺……盖原就高昌王宫建庙，崇祯时又复重修。清时又改为先师庙。”所云高昌王建都、高昌王宫皆因涉永昌镇石碑沟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而致误。

⑨ 危素撰文，《陇右金石录》卷五有录文。

⑩ 除以上两碑外，尚有实物已佚的虞集撰至顺二年（1331年）《孙都思氏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一六录有该碑全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下段右侧有1934年武威人贾坛、唐发科铭记云：“此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也……清末被土恶没之地中，后复凿其半为碾磨。癸酉（1933年）秋，始于高昌乡石碑沟访得其处，掘出之，移置教育馆”。见党寿山《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刊《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

⑪ 此碑背面镌回鹘文，回鹘文与正面的汉文并非对译，可能根据同一内容分别撰写，参看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刊《考古学报》1980年3期。卡哈尔巴拉提、刘迎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8期（1984）。

⑫ 《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亦记畏兀儿移居永昌事：“（中书平章政事斡栾）大父讳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仍封答融罕之号。亦都护来朝，挈家以从，跋履险阻，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之定居焉。”

⑬ 参看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年2期，党寿山《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

⑭ 陈庆英译本，p.206。

⑮ 陈庆英等译本，p.171。

⑯ 陈庆英译本，pp.207～208。

⑰ 据陈庆英等译，东嘎·洛桑赤列校注本，pp.44～45。

⑱ 据《萨迦世系史·昆氏家族之世系》的叙述推算，陈庆英译本，pp.173～175。

⑲ 《元史》最后一次记录只必帖木儿，见《武宗纪》二：“（至大三年〔1310年〕八月）己巳，以诸王只必铁木儿贫，仍以西凉府田赐之”。知其逝世当在此事之后。

⑳ 阔端子辈与萨迦除联姻关系外，八思巴与阔端第二子蒙哥都、第三子只必帖木儿关系密切。1251年，阔端、萨班相继去世后，八思巴写给以后为其授比丘戒的堪布法主札巴僧格信最末的文句：“阴水鼠年（壬子·1252年）二月三日，写于凉州王宫之佛殿，祝愿吉祥”（《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本，p.121）。其时，蒙哥都嗣王位。《红史》记1253年“当忽必烈汗驻在六盘山之时，凉州大王蒙哥都与上师（八思巴）一起前去会见，十分欢喜。王子忽必烈赠给凉州大王蒙古马军一百去迎萨迦人（指八思巴）……”（陈庆英等译，东嘎校注本，p.43）。《萨迦世系史》又记八思巴“为同辈人及后代写了无数语言流畅易于理解的著作书信和教诫等，其中……传授给皇帝的教诫及其要义类的有《给启必帖木儿所写的珍宝串珠》……《给启必帖木儿的信》……《给王子启必帖木儿的信》……为写造佛经而作的赞词有……《为王子启必帖木

儿写经而作之赞词》……回向及赞颂吉祥方面的有……《为启必帖木儿父母写的四行诗》、《为太王妃所写四行诗一首》"(陈庆英等译本，pp.152～155)。以上八思巴写给启必帖木儿的教诫、赞词等，内容虽不得其详，但从数量多、方面广，可以推知他们的关系远非一般施主与福田的往来。启必帖木儿即只必帖木儿。他们往来时间，据八思巴或称启必帖木儿为王子这一点考察，似应在阔端末年和蒙哥都嗣王时代，亦即自 1251 年迄八思巴于上都参加 1258 年僧道辩论前后。

㉑ 参看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刊《中国文物报》第 376 期（1994 年 3 月 27 日 3 版）。此经确为活字印本，但是否为泥活字版目前似尚难论定。

㉒ 乾定是西夏献宗德旺纪元，乾定四年德旺卒，次年（1227 年）夏主睍降，西夏亡。

㉓ 雍正四年石碣首行即云："大亥母者……"，可知其时洞或殿、寺名亥母。

㉔ 噶举派主要修法中有"亥母秘修"（参看土观·罗桑曲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第二章第二节别宗的源流·噶举派源流。刘立千译本，p.62），其著名事例有：塔波噶举创始人塔波拉结从米拉热巴学法，米拉热巴即授以"亥母加持法"（鄔诺·迅鲁伯《青史》第八辑大译师玛尔巴传承录及著名的嘎举派。郭和卿译本，p.299）；塔波拉结再传弟子桑杰热钦在住修时，曾亲见"至尊金刚亥母"（《青史》郭译本，p.314）；元至正二十年（1360 年）四世黑帽系噶玛巴乳必多吉至大都，为顺帝父子"授金刚亥母灌顶"（《青史》郭译本，p.327）等。《土观宗派源流》撰成于清嘉庆六年（1801 年）。《青史》成书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 年）。

㉕ 参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三章《西夏佛教发展概述·藏传佛教的发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pp.52～53。

㉖ 参看《青史》郭译本，p.38；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黄颢译注（二），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3 期，pp.25～27。《贤者喜宴》撰就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

㉗ 参看《青史》郭译本，pp.321～322、326～330；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六篇《噶举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pp.105～107。

㉘ 参看《青史》郭译本，p.331；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pp.107～109。

㉙ 武威以南经天祝、乐都抵西宁一线，多 14～15 世纪奉噶举、16 世纪后半以降改宗格鲁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现存并较著名的有：天祝境内的天堂寺、极乐寺、达隆寺，水登境内的妙因寺、显教寺，乐都的瞿昙寺、平安的夏宗寺和西宁的弘觉寺等。参看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p.6、48、69、554、558、560、562。

本文初稿是河西访古丛考之一《武威行》的第四部分，发表于《文物天地》1992 年 3 期，pp.5～10。此次汇集除一般正误外，增补内容较多的是 1994 年再访武威时新了解到的白塔寺与亥母洞的遗迹。